

辛丰年 李章 著

书信里的 的 辛丰年



李章：新年将到，祝你身体康健万事顺心！

其实我并不缺钱用，只是不想让老板们
随意剥削而已，反倒害得你多跑一趟
邮局，深悔多此一举！

纽约的时报上评论版就稿写去一文与站
版“慢条”都精采，读后为陆浩写一稿以还
债，此篇文章将来也许可纳入“手册”一用。

李捷 12.18

辛丰年 李章 著

书信里 的 辛丰年

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信里的辛丰年/辛丰年,李章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4

(脉望丛书)

ISBN 978 - 7 - 208 - 12431 - 8

I. ①书… II. ①辛…②李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7087 号



· 脉望丛书 ·

书信里的辛丰年

辛丰年 李章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2 字数 168,000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12431 - 8/I · 1280

定价 35.00 元

知音

严 锋

1991年3月，我从南通去复旦报考贾植芳先生的博士研究生，见到陈思和老师，他说真巧，王安忆和李章去南通看望你父亲了。王安忆当时已名满天下，我也已经做她粉丝多年，但她的先生李章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几天后回到家中，听父亲讲起他们夫妇的这次来访，我问他对王安忆有什么印象，他几乎说不上来，关于李章却说了很多，看来他的注意力全放在李章身上了。这也难怪，父亲对当代文学相当隔膜，音乐才是他更熟悉的语言。他爱了音乐一辈子，却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业余的门外汉，对门内的专业人士有特殊的敬佩。李章做过乐队指挥和作曲，属于父亲心目中的“专业人士”。后来又编辑大名鼎鼎的《音乐爱好者》杂志，在《读书》杂志上看到父亲的专栏，当即约他为《音乐爱好者》写稿。对于一位名不见经传、身居外省三线城市南通的民间爱好者来说，自然有知遇提携之恩。但是父亲对李章，有着超越共同爱好和编辑作者的联系。他常对我说，李章是个好人。在父亲的语汇中，好人是他对人的最高评价，非常难得。他自己也是好人，好人对好人，老实人对老实人，认真的人对认真的人，又有共同的爱好和话题，从此开启二十多年的友谊。

对于这第一次见面，李章这样写：“辛丰年焕然一身新军装，早早地等在我入住的有斐饭店门前，濠河在他身后流

淌，这画面庄严郑重，令我肃然。”我是在父亲去世后看到李章的文章才知道这情景，他对物质看得极淡，收入又都投入到书籍和音乐上，对衣服食品都完全不讲究。那套离休时发的新军装就是他最好的行头，极少的场合才穿上，他真的是对李章的来访看得很重了。二十二年后，李章去南通与他告别，也是一身黑色正装。李章说，这就像奏鸣曲式的两端，呈示与再现。

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不少李章的来信，都非常长，有的还精心地贴着各种照片。这些信都放在父亲写字桌的抽屉里，在他最触手可及的地方。这也令我吃惊，因为父亲这些年来经过两次令他痛苦不堪的搬家，已经把他的大多数个人物品都“处理掉”了。书和唱片都送给了我和他的朋友们，自己只留了约一百本，因为要和我弟弟弟媳一起生活，他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占太多的空间。他就是这么个极端为别人考虑的人。

同样，李章也保留着父亲二十年间给他的几乎所有信件。在这些信里，他们谈稿子，谈怎么办好杂志，谈音乐，谈淘碟，也谈自己周围的事情。这些信中能看出父亲很多文章的缘起和修订过程，看出他晚年爱乐的心路历程，也能看出世事风尚的变迁。这些年，无论音乐还是其他东西，都变得太快了，但是父亲和李章之间的相知相敬不变。

不变的还有父亲对李章的称呼：“李章同志”。今天的年轻人看到这称呼会觉得很奇怪，至少不相信这是老朋友间熟稔的语气。但我知道对父亲来说，“同志”就是他亲切而尊敬的用语，其意义超越世俗与时间。

不变的还有父亲这些书信的文笔，平实、简洁而有味，一如他的文章，只是更家常随意，读起来更放松。感谢李章的精心保存，我读这些信的时候，差不多能比较完整地还原父亲这几十年写读的历程。我所知的，可以参证；我不知的，可以补充。

父亲给李章的第一封信是1990年6月4日发出的。这一段时间，他们主要谈论的是《音乐爱好者》开专栏的事。据李章说，他给父亲的第一封约稿信是写给《读书》编辑部，让他们转发的，不久就收到回信。当时《读书》的君子之风，可见一斑。

有意思的是，父亲也谈了很多对杂志的设想和创意，从选题、栏目的设置，作者的推荐，到版式的改进，从一开始就提了许多建议。这种对杂志本身的关注，对上面文章的评点，一直延续了整整十年，直到李章离开《音乐爱好者》。我后来也参加办过杂志，今天重读这些信，换一个角度看，感觉他的编辑思想相当不俗。推荐的作者，比如徐迟、方平、鯤西、程博昼、何满子等等，都非常对路。而且他好事做到底，往往连人家的地址电话都附在信中。父亲外表冷峻严肃，其实骨子里极热心，尤其是对他感兴趣的人和事。另一方面，父亲当过多年福州军区军报《解放前线》的副主编，对办刊业务是熟悉的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：假如“文革”前也有《音乐爱好者》，假如我父亲不是编军报，而是编音乐杂志，会更加人尽其用吧。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又要感激李章，是他激活了父亲心中早被埋葬的许多热情和梦想，让他后来的人生得以弥补许多缺憾！



辛丰年与李章合影

这些信就像父亲的为人，完全没有废话，毫不矫饰。一切人事，喜欢的就是喜欢，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，直抒胸臆。正在看的书，正在听的音乐，他会热情地推荐（或不推荐）：

这一期全阅过。赵晓生的文章我很欣赏。你们应该盯住他多写一些。可憾《钢琴之道》至今看不到！（1991）

《天下风云一报人》、《费正清对华回忆录》都很值得一看，《红楼启示录》就绝妙！此公真是“学者化”了，了不起！（1991）

陈丹青文写得好，中国画人多能文，乐人似不如。（1993）

《燕乐探微》。才看了一部分，觉得既有见解，又有文采，很吸引人读下去。（1993）

不知注意到《布拉格》没有？我现在才发现，这是他最美妙的交响曲之一。尤其是第一章，那复调性与交响性真是太好听了！（1996）

前几天把莫扎特《布拉格》又听了一遍，享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欢悦，几乎是 ecstasy（狂喜）的感觉！我有两张，一是拿索斯的，一是 DG 中价片，是伯姆指挥维也纳，后一张更精彩。前些时函购（广州）到比切姆指挥的戴留斯选集，Decca 双片，这也是我最陶醉的

音乐，前年无意中发现，中文中的“惆怅”一词，在英文中似乎找不到对应之词，为此还特意去买了一部《林语堂汉英词典》，仍无结果。现在又发现，戴留斯的音乐即是“惆怅”一词的好注解！不过真正中国味的“惆怅”还须到黄自的《玫瑰三愿》、《春思》，以及陈田鹤的《江城子》中去找。（1996）

.....

但父亲不仅是热心的推荐者，也是谦卑的学习者和聆听者。这些书信也可以看出父亲几十年求知的足迹。他是个特别不愿麻烦别人的人，但是一涉及想看的书和音乐，这些自律仿佛土崩瓦解。他不断请李章帮他找书，找碟。1994年，他终于咬牙买了个索尼的CD随身听，碟片也成为他俩重要的话题。父亲退休金微薄，无力负担太多昂贵的碟片，所以这方面信息的交换就格外重要。但是，若遇到真正心仪之物，他会毫不考虑价格的问题：“今昂贵若此，只好等等再说，但假如有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全集，则愿以千元购之。不知有没有？拜托留心！”

信中提到的一个人名，特别让我感慨。1991年，我父亲应我中学班主任杨老师的邀请，义务为他们中学设计音乐欣赏课程，推荐曲目。父亲并随杨老师赴上海挑选唱片。在延安中路537号中图进出口上海分公司，父亲见到一位也是义务在那里帮忙的程博屋老师，两人相谈甚欢，并留下地址通信联系。这位程老师，是上海爱乐者中鼎鼎大名的人物，

对唱片熟得不得了。父亲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。我后来去中图也几次与程老师攀谈，受益匪浅。说到程老师，我就想起我最佩服的上海爱乐者兼音响制作者，一位自称“勃总”的网友。勃总身怀绝艺，睥睨天下，骂遍网络，真个是谁都不放在眼里。后来我专程去虬江路音响市场拜访勃总，他说音乐界他最佩服两个人，一位是程老师，另一位就是辛丰年。勃总的真名叫严峰。

父亲常赞李章的信内容丰富，很有看头。父亲这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几乎没有机会听现场音乐会（当然在“文革”前很多作品他连唱片也没有条件听到，只能通过读谱来感受），“文革”后，开始有世界顶级的乐团来访，但一则路途遥远，资费压力大，另一方面父亲也日渐年迈，无力远行，连吴祖强先生邀他去北京听世界四大乐团的演出也只能忍痛谢绝。而李章这方面的活动很多，每听必向父亲详细描述现场情景，使他感同身受，过过干瘾。这些年父亲对音乐界的活动的了解，很多都是从李章那里来。父亲也会把自己的理解与李章的现场报告结合起来。比如李章听了圣彼得堡国立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后，他们对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的《西班牙随想曲》进行交流：

可能我正受到您《兼听则明，冷暖自知》文稿的影响，跟同时演出的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一比，《西班牙》就是华丽，别的就没剩下什么了。而我以前是多要听《西班牙》呀！总谱也曾背过的，当时我特别迷里面的小提琴 Solo。其实他们演奏得最‘原本’，一开始全奏

就出我意料，主要是齐。齐，其实很不容易。还有铜管的和弦短促有力，刀切一般，又有弹性。短，其实也不容易，尤其发音迟滞的长号、圆号等，我们的乐队就是做不好。（李章）

你说《西班牙》只有外在效果，我倒觉得它比《天方夜谭》耐听，有热力，有较真的意境，可能因为里姆斯基-科萨科夫对西班牙的乐与舞感受深于‘东方’的？‘伪西班牙’胜于‘伪东方’。此作之配器当然是很有听头的，可惜总谱上有的东西，唱片上听不见。例如弦乐的泛音，这次你听出没有？（如总谱〔人音版〕P.75）我笔记上有两条，可以奉告……（辛丰年）

这样隔空的音乐对话，还有不少。盛年风景，相知乐事，是任何文章中难以见到的。

信中经常可以看到父亲说自己这也不懂，那也不懂。这不是矫情，确实是他的真实想法。父亲是把自己看得很低的，有个出版社出了本集子，收录了文人谈乐的文章，中国的收了他和李皖及另外一人，其他都是萧伯纳、茨威格等外国作家，父亲就很生气，觉得不应该把他与那些文豪并列，中国部分应该选更好的代表。李皖曾经在《中国图书商报》写过一篇论父亲的文章，对他颇有批评，大意是他那种风格过时了，不太适合现在的爱乐者。当时朋友们读到这篇文章后都十分生气。但父亲却说他批评得有道理，在给李章的信中对李皖相当赞誉，并建议把李皖批评他的文章收到将要出

的集子中，让读者可以更好地选择。

父亲的另一遗憾，是他觉得难以走进西方现代音乐的门槛：“来信使我为之震动又茫然自失的是那句话：20世纪将逝，而我们对它的音乐知之甚少。我痛感到自己对现代音乐之无知，但要补救似已无及，很有可能我自身也将随20世纪而去。可能还等不及。即便19世纪18世纪的，我所知也不多。要争取补课的话，补哪一头？我真是两头不着实了！”

与遗憾相随的，是信中无所不在的紧迫感。越积越多的书，越买越多的唱片，越来越抖的手，越来越无力的双腿，越来越弱的视力，各种来不及完成的写作心愿……从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，我看到父亲的衰老，无奈，和不甘。他不怕死，真的不怕死，但是他怕愚蠢而无知地死去。他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要尽量做一个明白人。他知道自己限度，但一直不放弃求知的努力。

在后期给李章的一封信中，他这样写道：

李章同志：

这个夏天，我才发现自己真是已经老了，而且老得厉害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症状是：走五百米以上，两腿就疲软，买米超过十二斤，拎起来就吃力得很，看书二十分钟，不休息一下就看不清楚了。尤其可怕的是早上爬起来，白天坐久了站起，头里便一阵黑，头昏眼花，不扶什么便站不稳。平时我经常不午睡，现在是终日老想睡，昏昏然。今年病倒过几次，虽过几天又起来，始终没能完全恢复过来。

这是自然法则，无法抗拒的。经过‘史无前例’能幸存至今，又看了那么多好书，听到了那么多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音乐，这就该感谢上苍了。所以我并不颓丧，泰然处之，照旧读书不辍。只是家务多（特别是要照顾小孩），空闲太少，眼又坏了，看书很慢，买来的好书积压未看或未细看的不少，使人着急，有负债乃至负罪感。

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，他这个人太好，但命运对他太不公，这辈子过得太苦，磨难冤屈之深重，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难以想象。但是父亲说得也对，上苍另一方面待他也不薄，给了他音乐和书，还有李章这样的知音挚友，其道不孤，确是苦难人生中的难得的快乐。

还给了他觉悟：“早死晚死我不在乎，不死于浩劫，反而苟延残喘性命至今（81岁了！）真没想到。可庆幸者，‘若使当年身便死’，我就成了个糊涂鬼。一个愚蠢的拜神者。如今则不必为此自惭了。”

对一个劫后余生者，还有比这更好的安慰吗？

辛丰年的信（代前言）

李 章

今年春，天多冷人多病，日月苦辛。3月26日，辛丰年先生离世，接下来他留给我们的空茫，将这寒春延长，悲凉中略感欣慰的，是3月26日，贝多芬去世的日子。

我知道，辛丰年喜欢的作曲家，贝多芬是排头位的。

5月初，严晓星E我一信：“严老走后，我非常非常的孤单。没人能说话了。以前读书，首先会想到有他可以分享。熟悉他的兴趣与思维，有什么也估摸着他会不会有兴趣，就跟他说。现在好不适应……”

我们都很失落，我们这群追随辛丰年的人，心中缺了角。我跟晓星，也是跟自己说，就读先生的书，读先生的信罢。否则，又能怎样！

我因工作关系结识了辛丰年先生，受教、交往二十余年，给他写信，给他打电话。后来，工作以外的通信和通话，也加入这惯性，成了自己感情的需要。其间不仅止于跟他学了很多知识，被他吸引，更重要的是，片言只语字里行间他纯良的心、高越的人格，力透而出，泽被后学如我辈。而感情的需要，终成依赖。以后，我怎么办呢？

3月以来，我几乎日日想着辛丰年，有时还会梦见，这在我是很少有的。我翻出先生的信，重读，浮想联翩。

李章先生：您好！今天收到来信与刊物，很感谢！

你刊一创刊我就看了，还写信提了些看法。近年的看得少，读此二期感到办得更好了。这是同科普一样有意义的“乐普”工作。

来信恳切，我感动又惭愧。自己是已退休的普通人。虽是乐迷，所知甚浅。无非听了些作品看了写文字资料而已。那些读乐文字是在《读书》编辑部启发之下乱谈了些感受，幸免方家齿冷，反而得到同好者认可，颇感惶恐！

《音乐与我》一栏之设是好主意。我向来极愿知道非音乐者听乐的情况，可惜我国的这种资料极少，令人觉得很多学者文人似乎都不爱乐。事实必不如此。你们如能把这方面的信息报道出来，既有史的价值，又会吸引更多人听乐。

多承约稿，拟一谈自己爱乐生涯的一点情况供您选用，七月上旬交稿，争取提早。可否？

祝

好

严格（辛丰年）

6.4.（1990）

这大约是辛丰年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，括号里的1990，是我查证出的年份。由于他写信不爱写年份，我又不爱留信封，我保存的信就都是仅有月、日，只能靠内容推测年份。

我是从《读书》上知道的辛丰年，他开了专栏《门外谈

乐》；1987年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《乐迷闲话》反响热烈，颇如先前出版的《傅雷家书》。1989年我有幸做了《音乐爱好者》杂志的编辑，便去向他约稿；没有联系方式，就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求助于《读书》杂志。查看日记，1990年5月2日记有一笔：“给辛丰年写约稿信，请《读书》转。”6月初便收到辛丰年复信，我大喜过望，由衷感谢《读书》的同行，他们处理读者来信的认真是我的榜样。

从此辛丰年便与《音乐爱好者》结缘，期期惠稿，准时准点，如扬帆乐海的班船。这船一开便是十年，直至我因病离开杂志。那十年先生的手抖尚轻，白内障的困扰姑且着，信件来往就比较多。头几封信我冲着开专栏去的，关于栏目名称我俩反复讨论。起初辛丰年拟用“乐史掇拾”，我觉得不够通俗；他又想出“乐迷话匣子”、“乐史杂碎”，我仍觉不理想；最后干脆沿用傅雷之说“音乐笔记”，请他定夺。

李章先生：您好！刊物收到。“音乐笔记”这名目我觉得不错。较实在，又可包容许多话题。我读书也常做笔记，音乐方面也记了好些。寄上一稿请指正，如可用，内容上的毛病，望予修削，不必客气。我欣赏一种说法：编者、作者是合作关系。

以下是关于办刊物的想法。思量多次，没想出多少可提的，先说几点，以后随时补充。

一、已介绍的乐人、作品、知识，相当广泛了。今后是否怕重复？我想不必怕。老题目上大有新文章可作。尤其从巴赫到德彪西这一段音乐史中的，特别是

巴、莫、贝、舒（伯特）、肖、瓦、勃、德这几人。其人其乐背景环境，材料是取之不竭的，而我们所知太少了。

例如，莫扎特的书信、贝多芬的同时代人看贝多芬、柏辽兹的音乐通讯和他的回忆录、瓦格纳与反瓦者对骂之久……这些资料都大可利用（上海有这些书）。

总之要让爱乐者获得更立体的知识、信息，深化其兴趣，提高其境界。

二、“音乐与我”也大有可为，如能像《一百个北京人》（张辛欣）那样搜罗，发掘，让名人与凡人无拘束地谈出真感受真体验，必能引人入胜，引起共鸣，将来可拔萃汇成一书：《一百个爱乐者》。有些人可能自己写不好，可以叫他谈，录音整理，要如实、如话，不要文艺腔。

三、要多多报道国内外乐情，但泛泛的应景新闻不好，广告、捧场式更不必。其实国外乐讯，他们刊物、报纸上一定很多。对中国听众感兴趣的人物、乐队、剧院动态，似看经常报道：马友友、梅纽因、小泽、帕尔曼、维也纳爱乐乐队、柏林爱乐乐队、斯卡拉、拜鲁特……国内外钢琴、小提琴、吉他等生产、销售情况，唱片、音响工具新情况（这应该是一个重要题目），乐谱、乐学书籍出版消息……

四、一个小点子不知是否可取：一部“左图右史”的西方乐史，看起来一定不枯燥。例如，一幅李斯特弹琴的油画，沙龙中挤满仕女，作种种风雅态，以此为